

外来词音译汉化研究

刘祥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催生外来词。汉语外来词要经过汉化才能被汉语接受。音译(外来)词汉化是外来词汉化的主要部分,但它具有自身特点,所以应准确表述为音译汉化。文章尝试定义音译汉化,探讨其特点与动因,分析音译汉化的各种方式,并将之归纳为三大类12种。

关键词:语言接触;音译汉化;汉化方式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2-0112-06

0 引言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流、语言之间的接触源远流长。汉语与许多语言有接触,吸收了大量外来词。一种语言在吸收异族语言的词语时总是以自己语言的习惯作为范本逼迫外语词语就范。只有乖乖臣服的外语词才能依附于这种语言的躯干之上,获得外来语资格,得到这种语言的容纳、接受,获准成为汉语言家族的正式成员。汉语也要对吸收的外来词进行形式处理或改造。这就是外来词汉化^①。外来词汉化是外来词汉语化的简称^②。

外来词汉化研究历时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外来词中数量上占多数的音译词的汉化研究却未得到应有重视。现有音译词的汉化研究基本上散见于外来词汉化研究中,专文专题研究极少。因而,要对音译汉化进行深入研究,音译汉化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是什么原因促使音译词要进行汉化,以及具体的汉化方式有哪些等,都应该首先弄明白。弄清楚了音译汉化的基本概念,才能避免赵彦春、吴浩浩(2017)所称的“音译的尴尬”。

1 外来词汉化

高名凯、刘正琰(1958)首先谈到外来词汉化问题。而第一个使用外来词汉化这个术语、且给予界定的,是李荣嵩(1985)。他说:“什么是外来词的汉化?一种外语的词一旦被汉语吸收,它就得按照汉语的特点和需要进行改造,从而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成员,这就叫汉化。”之后,杨振兰(1989)给予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内部的特殊规律,因此每一种语言在吸收其他语言成分的时候都要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汉语在吸收外语词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改造,一般称之为汉化。”她还区分了共时和历时汉化,分析了外来词的外来色彩。钟焜茂(1993)也给予了界定:“汉语从西方语言中吸收词语时,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汉化过程。也就是说,外来词在进入汉语体系时,会受到汉语、汉族文化和思维模式等因素的制

收稿日期:2018-11-25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音译汉化研究”(HN-0029-A)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音译字选择与音译词规范研究”(11YJA740054)的后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祥清,男,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汉化”一词有三种理解。第一,汉化指为便于理解和使用而“将用外语编写的计算机软件或程序翻译成汉语”,如“汉化软件”等。第二,汉化为“汉民族化”之略,详见陈友冰(1998:39-46)。第三,汉化是“汉语化”之略,本文所称“汉化”就是这一理解。

②外来词汉化是常用术语。也有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如高名凯、刘正琰(1958)称之为“外来词的创造”,张永言(1982)称之为外来词“被同化”,史有为(2000)称之为“外来词的走向”。

约,使之脱离它原来所属的语言系统。”界定中还指出了外来词汉化的制约因素,即汉语、汉族文化和思维模式。

进入21世纪,外来词汉化的界定越来越清楚。欧阳友珍(2002)将之界定为:“外来词从借出一方到借入一方,其语音、语义、语词结构以及字形等都要发生必要的变化,必须受到汉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的制约。所谓外来词的汉化,是指外来词从源语到汉语语言上的变化,它有一个对比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汉民族化的过程。”界定之外,还进行了科学分类,即将之分为语音的汉化、语义的汉化、语法的汉化和构词法的汉化四类。王英姿(2006)认为:“对于进入汉语的外来语来说,就存在一个如何为汉语所容纳和接受的问题,也就是汉化。所谓汉化,是指外来语言成分在语音、语形、语义结构以及语法规范等方面摆脱原语的束缚,遵从汉语规范的过程,是汉语内部规律对外来语言成分的一种强制性同化。”杨锡彭(2007)从语言文字本体角度探讨了外来词汉化所涉及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因素,并将汉语外来词汉化分为语音的汉化、语义的汉化、语法形式汉化和书面词形的汉化四类,并进行了详细分析。杨文还探讨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外来词是否汉化的标志:书面上,凡是有确定的汉语书写形式(或记录了汉语音节结构成分的汉语拼写形式)和确定意义的外来词,就是汉化的外来词。

汉语外来词汉化研究范围除了前面提及的概念和分类外,还有外来词汉化的原则(陈佳宁等,2011)、汉化的意义(欧阳友珍,2002)、汉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吴礼权,1994;杨振兰,1989;岳峰,2000;王催春,2012;张琼丹,2016)、汉化的优选论解释(张军梅,2011;张丽,2014)、佛源词汉化研究(何亚南,2003;李清桓等,2009;张诒三,2011)等。

2 音译汉化:定义、特点与动因

虽然汉语外来词有一个范畴界定的问题(杨锡彭,2007:19-30),但音译词属于外来词历来都是无争议的。与外来词汉化相比较后发现,音译词的汉化因为“音译成分是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的异质成分”,外语源词和汉语词在因素、词长和(表义或表音)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李运富等,2018)而变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也因此成为外来词汉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外来词汉化相比较后发现,音译词的汉化对象和方式表现明显不同,表现出自身特点。音译词的汉化,既包括像外来词汉化那样的、词汇层面对音译词进行形式处理或改造,也包括语音层面对译音方式的选择,还包括汉字层面对译音汉字字音和字形的汉化。因此,“音译词汉化”实际上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应改为音译汉化。

音译汉化是指一个外语词音译到汉语过程中根据汉语语言规则、汉语使用规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译音方法进行的灵活选择,对译音汉字及由译音汉字组成的音译词进行的形式处理或改造。

音译汉化的目的是改变其“舶来”形象,退去其外来色彩,消除其陌生感,让其融入汉语语言系统。音译汉化能够促进音译词在汉语中的规范和接受(刘祥清,2016)。

音译汉化之所以要进行,是因为:

(1) 汉语与外语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外语至汉语的音译没有字母转写的基础

考察中国翻译史发现,与汉语形成语言接触、产生音译词的语言,如梵语、英语、法语、俄语等,都是拼音文字、表音文字,而汉语是表意文字、语素文字。它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早在佛经梵汉翻译时期,支谦就有如此感慨:“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法句经序》)外汉语言之间的差异,使得外语到汉语的音译不像英语和法语之间的音译那样具有字母转写的物质基础。因为做不到字母转写,汉语音译就不能按照卡特福德(Catford, 1965/2000)所主张的音译三步骤那样亦步亦趋地进行,而必须借助译音汉字作为记音符号。这样产生的汉语音译词虽穿着汉语的外衣,有着汉语词语的样貌,但读来、听来都有陌生感,就有可能招致抵触、甚至拒绝,因而必须进行汉化。

(2) 译音汉字的纯粹记音功能与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汉语音译离不开汉字。汉语音译过程中所选择的译音汉字,单个来说,只是一个个的纯粹的记音符号。

这样构成的音译词是连绵词,各组成部分不能拆分开来理解。音译形式整体“假借”^①过来,被人为“赋予”与原词相同或相当的意义。其整体意义与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不相联系,不存在联合或偏正的结构关系。我们选字记音时,总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却又一厢情愿地假定,所选的译音汉字是暂借其形,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但“汉字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一个音节、一个形体、一个意义,三者密不可分。有音必有形,有形必有义。只要使用了汉字,就很难避开汉字代表的意义”(潘文国,2000)。汉语使用者看到这样的译音汉字时会拒绝接受,要么因为组合方式与心理预期不相符合,要么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启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来认读而产生莫名其妙的意义。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借助音译汉化而解决。

(3) 译音汉字的隐性理据与汉字因形见义的认知传统之间存在矛盾

汉语具有因形见义的传统,重视语义表现。汉字特有的表意属性决定了汉语字词生成过程中要讲究构词理据,即词的表达形式与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和文字理据。其中的文字理据就是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一个词的文字书写形式推断词义的特点,通过“形”把意义理据表现出来。这样,原来“隐性”的理据就转化为“显性”了。而音译词的理据是两种语言语音的相似或相同。这样的理据依然是“隐性的”。也就是说,外汉语言的词语理据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汉语在吸收外来词语的过程中一向比较审慎,很多时候音译只是权宜之计的缘故。外语和汉语语言的词语理据程度的明显差异导致音译词在汉语中有一种陌生感。一般来说,除非某种特定的修辞需要,汉语使用者在绞尽脑汁也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意译词的情况下,才会让音译词“幸存”。

权宜的、纯粹的音译形式摹了汉字之音、借了汉字之形,但去了汉字之义,人为割裂了汉字的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固有特征,人为地剥夺了汉字本来蕴含的习俗心理和承载的文化信息,因而违背了汉字认知上的因形见义的认知传统。汉语学习者和使用者习惯了见字知义、循形见义,习惯了从组成该词语的汉字的形态来揣度、理解它的含义。他们见到这样的纯粹音译形式,与汉语相比较,形式上格格不入,意义上找不到理据,就会想方设法地要对它们进行改造。换句话说,音译词要想在汉语中站住脚、被接受,就要经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音译汉化的过程。

(4) 译音汉字选择多样性与汉语异形音译词整理或规范之间的矛盾

何亚南(2003)说:“根据最终在汉语中生根的早期音译词来看,汉语在吸收外来音译词时明显有着自己的制约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外部原因,而前者是这一机制的主体部分。”这种制约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即汉语词汇特点对吸收外来音译词的制约,汉字系统的特点对吸收外来音译词的制约,社会背景对吸收外来词的制约。虽然汉语音译词形成过程中有着上述三个方面的制约,但汉语中同音字、多音字占优势为译者对汉字的主动选择提供了客观便利,其结果就是人译人殊、千人千译,“音译娱乐化、个性化”(杨锡彭,2007)和“音译回潮”(辛红娟等,2012)。这样的音译混乱和音译词泛滥,给语言交际带来诸如异形词选择、整理和规范化等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梵语 Namo 音译成汉语,曾经出现“南摩、南谟、那谟、纳谟、纳慕、囊谟”等音译异形形式,最后定型为“南无”(音 nāwù)。英语 E-mail 或 email(意译“电子邮件”)也出现过不同的音译形式“伊妹儿、伊妹、依妹儿、妹儿、伊媚儿、伊眉儿”。对汉语异形音译词选择、整理和规范化,就要符合汉语语言习惯、使用规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就要按照语用导向和学理导向进行,而这正是音译汉化。

3 音译汉化的方式

音译汉化要借助不同的汉化方式来实现。项啸虎(1990)、钟焜茂(1993)、杨锡彭(2007)等都探讨过音译汉化方式。罗常培(2004)说:“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把它们写成谐音字。”其中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就是音译词汉化

^① “假借”一说详见龚雪梅(2006)。

常用方式之一。笔者(2014)也曾将音译汉化方式概括为音译简化和音译意义化两大类。

基于以上探讨和对音译汉化的认识,综合考虑音译汉化的自身特点,拟将音译汉化方式归纳为以下三大类12种:

3.1 对译音方法进行灵活选择

语音一一对应法或汉读法译写 汉语音译过程中,选字记音的方法有两种,除了熟悉的语音一一对应法(coffee 音译为“咖啡”)外,还有汉读法(如 Trump 音译为“特鲁姆普”“特朗普”或“川普”)。汉读法译写“是把外文字母改换为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并转化为汉语的音节形式,尤其是结合外语词音节的切分和汉语译名的音节表达,而不管外文字母在原文里是否独立记录了语音,也不管外文字母在原文里读什么音。”(杨锡彭,2007:199)汉读法译写是汉语音译特有的,为音译汉化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有效解决了外语和汉语语音系统不对应的问题,是语音汉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3.2 对译音汉字进行必要的形式处理或改造

对译音汉字进行必要的形式处理或改造包括译音汉字字音和字形进行形式处理或改造。

译音汉字字音处理有三种方式:

(1)音节简省,主要是指多音节外语词音译成汉语时选取部分音节译写,或采用一一对应方法全音译后选取其中一、二个音节独立成词或作为构词成分与汉语成分组合新词。音节简省还包括外语首字母缩略词照字母发音音译,如俄语 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 КГБ,音译为“克格勃”。音节简省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汉词词语双音节化、三音节化的一般特点,满足语言“经济、简便”的需要。

(2)音节繁化,是指单音节外语词音译成汉语时为适应汉词词语双音节化的一般特点而增加音节,使之成为双音节词,如单音节英语词 gene 音译成汉语双音节词“基因”。

(3)音素替换,外语和汉语的音节数量和音节组合方式存在不对称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音素进行音素一一对应译写时必须对原外语音素进行必要的替换处理。如英语 rifle 的汉语音译形式为“来复枪”,英语语音体系中的小舌音/r/,汉语语音体系中没有,音译时就用比较接近的边音/l/来替换。

译音汉字选择具有多样性,译音汉字字形处理是音译汉化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1)选择译音汉字,借助形旁表义。一个外语词的众多汉语音译形式的整理和规范中,按照罗常培(2004)说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办法有提示意义的形旁的音译形式,如梵语“mallikā”的有草字头的音译形式“茉莉”,马来语“pinang”的有木字旁的音译形式“槟榔”等,其音译为社会接受,因为它们满足了汉语汉字因形见义的认识传统。傅兰雅主张的音译化学元素时以平常字外加偏旁形成汉字形声构字,其形声偏旁也有提示意义的作用。这一办法对汉语化学元素汉译术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仍在使用的。

(2)选择译音汉字,形成“意义别解”。外语词音译过程中,所选的汉字只是记音符号,其意义被“弃用”。但一些音译词中的汉字的字面意义被“起用”,字面上形成了有理组合,但其意义与原词的意义无关。这就是汉语音译“意义别解”。这种“意义别解”初看起来满足了汉字使用者的因形见义的认识传统,因而具有积极意义,成为重要的音译汉化方式之一。常见于商标音译(如 Benz 音译为“奔驰”)、人名音译(常将其中的一个音节用汉语姓氏汉字来译写,“使从汉姓”,如 Timothy Richard 音译为“李提摩太”,John Fryer 音译为“傅兰雅”等)和地名音译(译者常将自己的感情色彩附着在音译字上,如诗人徐志摩将 Florence 音译为“翡冷翠”)中。

(3)选择译音汉字,形成“循音赋义”。“循音赋义”是黄河清(1994)首先提出来的,即汉字中单音节语素的绝对优势造成汉字的基本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那就是习惯于每个音节(写下来就是汉字)都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也要附会出意义来。当然,这个附会出来的意义不是原词所有的。汉语音译的“循音赋义”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译者之意。戴季陶音译 Gandhi Mahatma 为“甘地”,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之义,是译者个人附会的意义。二是读者之意,即读者在认读音译词时附会出来的意义。“卡式炉”是英语 casserole 的全音译形式。但认读过程中,“式”和“炉”都读出了字面意义,“卡式炉”因而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式样别致的炉子(潘文国,1996)。周日安、向玉兰(2002)说的“临时汉化”(如“他吓得出了一身阿富

汗,拔腿跑进了名古屋,赶快关也门,结果碰掉了一颗葡萄牙”)都是读者^①之意。

(4)选择译音汉字。形成“音义兼译”^② 外语词音译过程中,既注意到原词的声音,选择声音相近的汉字来译写,又在用字表意上兼顾原词的意义。这样,汉语语素义与原词词义形成某种紧密联系,形成“谐音译”(史有为语)。这样的音译既取其音,又取其义,音意兼译,音义双关。常见译例有:bully(霸凌)、基因(gene)、引得(index)、绷带(bandage)、媒体(media)、乌托邦(Utopia)、弗晰(fuzzy)、香波(shampoo)等。

(5)创制新译音汉字 汉语音译时,译者总是尽量地选择汉语中已有的汉字。但语言接触频繁时,有些新概念,从汉字库里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汉字来表述。于是,译者就根据语音对应原则,依着原词的音(一般是其中的一个音素),依照汉字造字方式,创制新的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以满足翻译的需要,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佛经翻译中出现的“梵”“魔”“僧”“塔”“杆”“呗”,现代化学元素译名等都是新创制的译音汉字。这些字因为采用形声法创制,符合汉语造字的基本特征,虽数量不多,却是汉语音译汉化的一个重要方式。

(6)改造原有汉字。汉语音译中,也有通过添加“口”字旁改造现有译音汉字进行音译、实现汉化。这样汉化有不同的目的。佛经翻译时期,佛经六字真言“唵嘛呢咪咪吽”(梵语 om mani padme hūm 的音译,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咒)是为了“秘密”或“生善”,为了求得特殊的语言效果。明末清初及以后,选择现成汉字加“口”字旁进行音译,用以标示所译之物与汉语文化之不同,如英制长度单位 mile、foot 的音译形式“哩”、“呎”。焦国标(2000)、谢贵安(2008)专文分析过明末之后外国国名中出现的在一般译音汉字前加口字旁的音译。焦国标(2000)指出:“汉语译外词时,加口旁表示与叽里呢啦语言不通的异族有关。在华夏文明之初,那是加虫旁加犬旁的。选择英吉利作声旁,加口字旁造出新的形声字“口英(合为一字,口旁英字)咭喇”,足见一种心理规格待遇。最后省去口旁,仅作英吉利,就等于顶礼膜拜馨香而祝了。

3.3 对音译词进行必要的形式处理或改造

(1)音译字后增加表义语素。音译字确定后,再在其后增加表义语素,以使其意义凸显。如梵语 daksina 的音译词“达𠵿(𠵿)”,为“施舍”之义,后单音化与“施”连用,形成“𠵿施”,“施舍”的意义更加明确。后来,再按照前述的第五种办法将“𠵿”字的口字旁改为“貝”字旁,生成一个新字“𠵿”,“施舍”义更易于接受。

(2)音译字后增加表类名词。音译汉字确定后,再在其后增加表类名词,起提示意义类别的作用。如英语的“car”的音译词为“卡车”,就是在译音汉字“卡”后缀加表类名词“车”形成的。

(3)音译词让位给意译词。汉语中很多的音译词是作为权宜之计存在于汉语的,它们起到了临时救急、权宜使用以填补词汇空白的作用。这样的音译词一旦完成使命,就会退出汉语交际舞台,让位给意译词。

4 结语

音译汉化是音译词为汉语接受的必由路径,是汉语音译词规范化的基础。准确认识音译汉化概念,掌握其特点、动因和各种各样的具体方式,能够有效避免音译混乱和音译词泛滥,防止音译尴尬,能够提高音译汉化的认识,更好地让其为汉语语言服务。现有音译汉化研究还未得到应有重视,应予加强。对音译汉化的文化战略价值进行研究,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推进汉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密切相关,具有新时代意义,更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 Catford, J. C. 1965/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ini, Federico.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Berkeley, USA.

① 这里说的“读者”意义比较宽泛,包括这些“临时汉化”的撰写者和阅读者。他们都是“阿富汗”“也门”等音译词的“读者”。

② 所谓“音义结合”,不是“门当户对”,也不是吴礼权(1994)所称“音义密合”,只是音相似义(整体)相连,即汉语音译词与外语原词比较,语音相似,整体意义不是从译音汉字解读出来的,只是与原词有着某种似有似无的联系而已。

- 陈家宁,林哲.2011.谈汉语外来词的汉化处理[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76-480.
- 陈友冰.1998.“汉化”刍议[J].史学理论研究(1):39-46.
- 高名凯,刘正琰.1958.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何亚南.2003.从佛经看早起外来音译词的汉化[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155-160.
- 焦国标.2000.音译词的意译成分[N].人民日报(海外版),10/09.
- 李清桓,袁宇.2009.从佛教语汇浅析佛教汉化的历程[J].江汉论坛(4):124-126.
- 李荣嵩.1985.谈外来词的汉化[J].天津师大学报(2):94-97.
- 李运富,牛振.2018.鸦片战争前后国名音译词考察——以《海国图志》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8-140.
- 梁晓红.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刘祥清.2014.论音译形式及其丰富与发展——以外汉音译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6):242-245.
- 刘祥清.2016.音译汉化与音译词在汉语中的规范与接受[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9-133.
- 罗常培.2004.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
- 欧阳友珍.2002.现代汉语外来词汉化轨迹及规律初探[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127-131.
- 史有为.2000.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吴礼权.1994.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82-107.
- 项啸虎.1990.名词术语译法初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96-100.
- 谢贵安.2008.从固守天朝立场到融入世界文明秩序——从西方汉译国名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J].学习与探索(1):225-231.
- 辛红娟,宋子燕.2012.汉语外来词音译回潮之文化剖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6):220-224.
- 杨振兰.1989.外来词的汉化及其外来色彩[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6-80.
- 杨锡彭.2007.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岳峰.2000.略论音译与中国传统文化[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4-57.
- 张军梅.2011.从优选论看音译的制约条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16-120.
- 张丽.2014.外来词词形选择制约因素的等级序列[J].现代语文(7):22-25.
- 张诒三.2006.试论佛源外来词汉化的步骤[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6):9-11.
- 张永言.1989.汉语外来词杂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2):86-97.
- 赵彦春,吴浩浩.2017.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和译学思考[J].外语学刊(6):100-106.
- 钟焜茂.1993.现代汉语对外来词的接受与汉化[J].龙岩师专学报(2):85-86,94.

On Chineseliz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LIU Xiangqing

Abstract: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led to loan words coming into being in Chinese. These loan words will be accepted by way of chineseliz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lization of transliterated loan words is, in fact, not a proper phrase, and should be said as chineseliz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instead. This paper aims to define what chineseliz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is, why it occurs and how it is done.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chineseliz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method of chineselization

责任编辑:冯革